

论西方道德心理研究的新综合取向：道德基础理论

张梦圆，苑明亮，寇彧

【摘要】个体的道德系统不仅包括评价道德水平的道德形式，而且也包括界定道德范畴的道德内容。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心理研究重视道德形式，忽视情绪因素，未能充分揭示道德判断规律；忽视道德情感与行为，未能系统描述个体道德全貌；忽略文化多样性，反映出有限的道德内容观。随着多学科的发展与交流，新综合取向的道德基础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道德具有先天性、可塑性、直觉性和多元性四个基本特征，包含关爱 / 伤害，公平 / 欺骗，忠诚 / 背叛，权威 / 颠覆，洁净 / 堕落五元道德内容，后新增自由 / 压迫共六大道德内容。基于该理论的应用研究，涉及个体心理特征与多元道德内容的关系、不同群体道德内容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道德内容差异性对个体态度的预测三个方面。未来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不同道德内容对于个体社会行为的交互影响，以及多元道德内容基础上的个体道德发展。

【关键词】道德内容；道德基础理论；多元道德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应用实验心理北京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5）

社会生活中的个体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与德有关的情境。然而，是与非、善与恶、高尚与卑劣都需要在特定的参照系统中评判，这一系统所涵盖的范畴就是道德内容，在其范畴内根据参照点进行量化评价的过程则是道德形式。在相同的道德情境下，关于行为道德性的不同声音反映出个体道德内容及道德形式的差异。心理学家曾多次试图从个体道德发展的角度解释这些差异。Piaget 和 Kohlberg 用环环相扣的问题细致地考察了儿童道德推理过程，认为人们道德判断的差异源于使用了不同的推理原则(Piaget, 1965; Kohlberg, 1971)。然而关于道德内容范畴本身的探讨却长期处于研究的边缘地带。

近二十年来，随着伦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间渗透的加强，道德这一古老的话题又迸发出新的活力。道德内容研究逐渐被重视，道德形式研究愈加纵深化。道德心理学的“新综合取向 (new synthesis approach)” 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道德是在心理机能调配下，由多元道德价值观念、多种道德行为实践和多样化的社会习俗共同构成的心理系统，该系统通过抑制和调节个体的利己性来维护日常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 (Haidt & Kesebir, 2010)。基于这个概念，Haidt 及其合作者建构了道德基础理论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MFT), 系统论述了道德的先天性、可塑性、直觉性和多元性特征。该理论对于全面考察道德内容, 深入理解道德形式, 发现和解释不同文化群体的道德差异有重要意义。

一、道德基础理论及其应用

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 Theory)又译作道德五基准理论(张彦彦, 陈浩, 2010), 是基于进化心理学和多元文化的道德新综合理论体系, 有四个基本理论假设和五个道德基础。

(一) 四大基本假设和五元道德基础

假设 1, 道德来源于进化, 是先天性的反应机制。进化过程中反复遇到的适应问题会促使人类产生相应的模块化适应机制(Tooby & Cosmides, 1992)。社会管理与交往的需要使得人类形成了先天道德性(Haidt, 2012), 它先于个体经验存在, 是个人道德系统的发展起点, 为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习具体的道德规范及行为模式提供了敏感性基础(Graham, Haidt, Koleva, Motyl, Iyer, Wojcik, & Ditto, 2013; Deloache & Lobue, 2009)。

假设 2, 道德具有文化可塑性。长期进化使人类形成了共享的道德基础, 但却会因为不同的外在环境而表达出不同的具体应对方式, 最终形成多样化的道德系统。例如由于资源总量与获取资源方式的差异, 游牧民族比狩猎—采摘、耕种民族的组织结构更为松散、流动性也更大, 对于内群体忠诚和权威性层级关系的要求也就相对较低(Fry & Souillac, 2013)。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会习得特定文化背景中的道德规则及行为模式, 在先天道德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包含情绪、动机和行为的, 具有文化特异性的直觉反应链接。例如, 印度儿童被反复教育遇到长辈及权威人士应当鞠躬表示尊敬, 因此当初次遇到颇负名望的政治家时便会做出自动化的反应, 而在美国社会中成长的孩子则不会有类似行为(Graham et al., 2013)。

假设 3, 道德判断直觉先行, 推理在后。道德基础理论认为, 人们面对道德情境时是通过快速而自动化的直觉反应得到判断结果的。这种直觉反应来源于进化, 情绪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Haidt, 2001)。道德推理具有明显的动机特征及社会策略性目的, 它只是为道德判断做出解释及辩护, 且会受到判断结果、自身利益、内群体认同、情绪启动的影响(Mercier & Sperber, 2011)。不同群体对道德内容范围的重视程度差异会造成个体对相同道德事件的直觉反应不一(Haidt, 2012)。

假设 4, 道德内容是多元的。从道德来源的先天性假设可知, 人类的道德内容范畴取决于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的要求。因此, 照顾亲代、在群体内获得更多资源、在群体间取得竞争优势等不同的适应要求, 造就了人类道德内容的多元特征。这些不同道德内容普遍存在于不同文化个体的头脑中, 有不可替代的特异性神经基础(Graham et al., 2013)。

依据上述四大基本假设，Haidt 及其合作者梳理了已有的多元道德内容及实证研究，提出了人类共有的 5 种基本道德内容。每种道德内容都同时满足先天存在性、共享意向性、直觉反应性以及跨文化普遍性的特征，都有相应的适应性挑战、诱发源、直觉反应和具体的情绪表现(Graham et al.,2013)被称为五元道德基础。

关爱 / 伤害(Care/Harm)。与关心、照顾和保护他人免受伤害相关的道德内容与反应。为了照顾后代和亲属以保证物种延续，人类进化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利他性以及其他与关爱和伤害相关的道德内容。例如弱小的孩子或正在承受痛苦的他人都会激活个体的同情心，并会使人们对施害者产生愤怒(Graham et al.,2013)。

公平 / 欺骗 (Fairness / Cheating)。在与非亲缘关系的人进行价值交换和社会互动时，为确保双方的利益共赢而形成的道德内容。进化心理学认为对欺骗与合作敏感的个体易获得充足的生存资源，具有进化优势 (Triver, 1971)。而欺骗、作弊、分配不均等行为会触发人们对于公平的敏感性，并引发愤怒、内疚 (Graham et al.,2013) 以及厌恶 (Chaman, Kim, Susskind, &Anderson, 2009); 慷慨、回馈等则会引发感激 (McCullough, Emmons, &Tsang, 2002)。

忠诚 / 背叛 (Loyalty / Betrayal)。在多个群体竞争的环境中，个体指向其所在群体的道德内容。对内群体的忠诚能使群体在进化中更具有凝聚力，从而在环境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利益。背叛内群体、破坏群体规则的行为会引发人们对背叛者的愤怒 (Roccas & McCauley, 2004)。反之则使内群体成员获得自豪感、荣誉感 (Graham et al., 2013)。

权威 / 颠覆 (Authority / Subversion)。个体在层级化群体中互动时指向上下级的道德内容 (尊重服从上级，保护下级)。其进化基础是群体内部的资源划分和权力争夺所形成的合法而不对称的地位 (Rai & Fiske, 2011)。破坏秩序会引发人们对无序的焦虑和对破坏者的蔑视等情绪 (Graham et al., 2013)，而尊敬和服从则被看作是与权威相关的美德。

洁净 / 堕落 (Sanctity / Degradation)。与保持圣洁，避免玷污相关的道德内容。为了避免感染疾病，人类在进化中形成了能迅速检测危险信息，并通过厌恶反应自动远离危险的行为免疫系统 (Schaller &Park, 2011)。为了发挥最大限度的保护和适应功能，该系统所侦测的危险信号不仅包含腐败的食物、病菌，还笼统地包括可能带来危险的“不干净”的个人及群体，例如传染病患者或污名化群体 (Navarret & Fessler, 2006)。另外，宗教信仰、国家认同等将人们联结到一个个道德共同体中，代表其核心价值的象征性标志 (如十字架等) 就具有了类似意义。当这些标志被亵渎或冒犯时，个体的洁净道德基础同样会被迅速激活，引发厌恶情绪 (Haidt, 2012; Wu, Yang, &Chiu, 2014)。

（二）道德基础理论的应用

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并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道德基础理论的应用研究，首先是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在此基础上，心理学研究者又进行了五元道德内容与不同心理特征的关系、道德内容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道德内容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1. 道德基础问卷的开发

基于道德基础理论，Haidt 及其合作者（Graham, Nosek, Haidt, Iyer, Koleva, &Ditto, 2011）编制了道德基础问卷（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 MFQ），该问卷共包括“关爱、公平、忠诚、权威和洁净”五个维度，含 30 个项目，采用 6 点计分，其中每个道德基础维度又包括道德相关性（Moral Relevance）分量表和道德判断（Moral Foundation Questionnaire, MFQ）分量表。前者列出了每个道德基础较为抽象的概念领域（例如“某人是否有不公平的行为”等），要求被试评估其道德相关性；后者用于测量被试对具体和情景化的道德判断的赞同程度（例如“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会尊重权威”等）（Graham et al.,2011）。因此，该量表不仅可以测量个体对具体道德问题的观点，还能反映其对该道德内容的敏感性。实证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区分效度、聚合效度与预测效度，并具有跨文化和跨时间的稳定性。良好的测量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道德基础理论的合理性。

2. 探索多元道德内容与个体心理特征的关系

探讨道德内容与个体心理特征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各个道德内容的功能和作用范围，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进社会行为、心理健康等领域的研究。有研究表明不同道德内容与个体心理特征之间存在特异性关联。例如，高内疚倾向的个体对关爱的重视程度远超过尊重和权威（Ent&Baumeister,2015）；关爱与亲社会性正相关，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负相关；尊重、权威与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社会支配倾向均呈正相关(Niemi&Young, 2013)。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发现，非诊断性的精神病态人格者的关爱和公平得分较低（Glenn, Iyer, Graham, Koleva, &Haidt, 2009）；另外，动机领域的研究发现，高激活模式（调节定向模式之一，关注控制和管理，强调行为目标间的连贯性）的个体对忠诚、权威及洁净三个道德内容赞同度更高（Cornwell&Higgins, 2014）。

3. 探索不同群体道德内容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五元道德内容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面。关爱、公平从个体问题层面强调了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保护和尊重他人，属于个体化的道德基础（individualizing foundations）；忠诚、权威和洁净则着重解决将个体联结到群体或道德共同

体之内的问题，是关于联结性的道德基础（binding foundation）。该划分方式不仅在测量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存在不同的神经生理基础（Graham et al., 2011; Lewis, Kanai, Bates, &Rees, 2012）。

一项全球范围的跨文化研究将被试按生活区域划分成西方文化群体（美国、加拿大、西欧）与东方文化群体（东亚、南亚、东南亚等）。研究发现，东方文化群体对于忠诚和洁净的评价高于西方文化群体，而在另外三项道德内容的评价上并无明显差异（Graham et al., 2011）。学者认为，某个国家历史上的病原体流行率可以显著地预测个体对联结性道德基础的赞同度，病原体流行率和传染恐惧可能提高了群体凝聚力和集体主义（van Leeuwen, Koneig, Graham&Park, 2014）。另外，探讨城市化水平、社会阶层等生态因素与道德内容关系的研究发现，高社会阶层的美国民众在关爱的道德内容上得分较高，在忠诚的道德内容上得分较低（Leeuwen, Koenig, Graham&Park, 2014）。

4. 探索道德内容的差异对个体态度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所持有的道德内容能够预测个体对特殊群体的态度。例如关爱维度得分能够正向预测人们对于护士、护工等职业人员的态度；洁净维度得分则能负向预测个体对于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者的态度（Haidt&Graham, 2007; Graham et al., 2011）。另外，联结性道德还与一般性的群际敌意和歧视呈正相关，而个体化道德则与群际敌意和歧视负相关。当然，也有研究表明，只有个体的道德认同较低时，较高的忠诚、权威、洁净等道德内容倾向才会导致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Smith, Aquino, Koleva, &Graham, 2014）。

政治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关爱、公平与自由主义的信念正相关，忠诚、权威、洁净与保守主义信念正相关（Graham, Nosek, &Haidt, 2012）。无论持有何种政治意识形态，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者更看重个体化的道德基础，保守主义者更看重联结性的道德基础。同时，人们也会夸大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即自由主义者会高估自己的个体化道德而低估联结性道德；保守主义者则相反（Graham, Nosek, &Haidt, 2012）。此类发现有助于理解持不同政治信念的人之所以对同性婚姻、堕胎、死刑等敏感议题存在巨大争议，并非因为社会管理中的具体政见，而是深植于其大脑中的道德直觉所致（Koleva, Graham, Iyer, Ditto, &Haidt, 2012）。在对待争议性的社会话题上个体不同的道德内容得分比年龄、性别、宗教和政治立场更能预测其态度。例如，高关爱得分的个体对暴力和犯罪问题特别敏感，高忠诚得分的个体会竭力保护国旗免遭亵渎，而高洁净得分的个体对堕胎和安乐死持拒绝的态度（Koleva, Graham, Iyer, Ditto, &Haidt, 2012）。对于外交政策态度的研究表明，重视关爱和公平的个体更倾向于采用合作的国际主义政策；而重视忠诚的个体

更倾向于激进的国际主义政策 (Kertazer, Powers, Rathbun, & Iyer, 2014)。可见, 道德基础理论对于道德内容的多元划分为探讨同一社会事件提供了多重分析视角。

二、基于道德基础理论评价传统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

道德基础理论并非空中楼阁, 除了基于进化的机能主义视角和对多元文化的观察, 还包括对认知心理学派等多家观点的批判性继承。

20 世纪 90 年代前, 心理学中的道德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心理学领域 (Haidt, 2012)。Piaget (1965) 认为, 儿童的道德发展主要体现在对规则的认识和运用上。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成熟, 儿童会建构性地获得关于尊重规则、适应规则、改变规则的一系列道德知识, 最终发展出良好的道德推理能力。Kohlberg 继承并发展了 Piaget 的观点, 将儿童道德判断的推理原则作为指标考察其道德发展水平, 并建立了迄今为止道德心理学领域影响最为广泛的道德发展阶段论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of Morality, Kohlberg & Candee, 1984)。

道德基础理论的多元道德内容与道德发展阶段论的认知推理原则具有一定的对应性。有研究发现, 道德推理发展的第 2 (简单互惠定向) 和第 3 (好孩子定向) 阶段与忠诚 / 背叛的道德内容正相关, 第 4 阶段 (维护秩序定向) 与权威 / 颠覆的道德内容正相关, 第 5 (社会契约定向) 和第 6 阶段 (普适原则定向) 与关爱 / 伤害和公平 / 欺骗的道德内容正相关 (Baril & Wright, 2012)。也有研究表明, 人们在进行和自己无关的、单纯的道德判断时, 更倾向于理性思考并使用更高级别的道德推理原则, 而在进行和自身高相关的或复杂的道德判断时, 则会使用低阶的道德推理原则 (Wark & Kerbs, 1996)。

Piaget 与 Kohlberg 对于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 确立了道德判断和推理在道德心理学中的核心地位。这影响了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道德心理学的探索方向。期间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围绕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推理能力发展开展道德判断的研究。后人从不同方面对道德发展阶段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例如 Gilligan 认为 Kohlberg 所关注的公正化规则局限于“男性的道德”, 而女性则更关注涉及伤害、生命、关怀的“关爱”道德内容 (Gilligan, 1982); Turiel 从生活领域的视角区分了个体判断社会事件所依赖的不同规则系统 (仅涉及个人选择或偏好的属于个人领域的事件, 涉及社会期望和习俗规则的属于习俗领域事件, 而与公正和伤害相关的则属于道德领域事件), 认为道德发展阶段论只适用于道德领域的事件 (Turiel, 2006)。然而, 这些研究者实际上都是关注道德形式的“唯理论”者, 即认为道德的知识是通过理性思考和严谨推理获得的, 个体及群体差异只是同一标尺下能力与发展水平高低的反映。因此该理论流派至少存在四个先天不足, 下面分别评述。

(一) 传统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未能充分揭示道德判断规律

一直以来，以康德的道德唯理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道德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判断是非善恶依靠的是理性推演。但大量证据表明，推理与判断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判断过程会受到情绪、时间、卷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增加个体的卷入程度（Greene & Haidt, 2002）与减少判断时间（Suter & Hertwig, 2011）均会促使个体做出更多非功利性道德判断。与直接的情绪反应相比，评估损失和代价对个体道德判断的预测作用微乎其微（Haidt, 2007）。另外，研究还发现即使是6至10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够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选择合作性更高的伙伴（Hamlin, Wynn, & Bloom, 2007）。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道德推理只提供了事后解释和对判断结果的辩护，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观点正确合理而非辨明真理（Mercier & Sperber, 2011）。这也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支持，即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负责处理情绪信息的腹内侧前额叶（vmPFC）被明显地激活，其他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如脑岛、扣带回和楔前叶）也有不同程度的激活（Haidt & Kesebir, 2010）。

（二）传统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未能系统描述个体的道德行为

Kohlberg 及其后继者关于思考与行动关系的基本假设认为，人会依照正直的思想去行动，如果拥有是非判断与承担责任的正确观念就会做出道德行为（Kohlberg & Candee, 1984）。然而，大量研究表明，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只存在很低的相关（Krebs & Denton, 2005）。道德推理能力并不能准确反应个体的具体行为决策，道德认知水平较高的个体，甚至会依据不同的情境做出完全不同的、差异更大的决策（Krebs & Denton, 2005）。例如在进行口头选择时，高道德认知的人们会倾向于公平决策，而在实际完成任务分配和方案选择时却会做出利己的行为（Batson, Thompson, Seufferling, Whitney, & Strongman, 1999）。另外，情境因素也会对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与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暂时性的权力感提高会增加个体的欺骗行为（Dubois, Rucker, & Galinsky, 2015）；情境中不良示范性规范的凸显，也会降低个体的捐赠行为（傅鑫媛，陆智远，寇彧，2015）；环境中的某些隐形线索会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禁止性标语等显性线索会降低个体不道德行为的发生频率（Cai, Huang, Wu, & Kou, 2014）。

（三）传统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反映出有限的道德内容观

传统道德研究基于个体主义文化下的道德体系，强调规则、追求普世价值（Henrich, Heine, & Norenzayan, 2010），其道德内容的范围很大程度上仅包含维护合作与利益，以及保护个人生存权益两个方面（Graham et al., 2012）。然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之外的其他人群中则有更大的道德内容范畴。例如，Shweder 发现在印度，儿子直呼父亲的姓名、女人便后不换衣服就做饭等都被看作是不道德的，虽然这些行为并未涉及伤害（Shweder, Mahapatra,

&Miller, 1987)。Shweder 于是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道德内容模型：道德包含自主(autonomy)、集体(community)和神圣(divinity)三个层面。自主层面的道德体现了个体的需要和保障，集体层面的道德体现了个体作为团体成员的社会责任；神圣层面的道德体现了个体与宗教、神圣象征的联系，以及保持贞洁、避免遭到玷污的需要(Shweder, Much, Mahapatra, & Park, 1997)。这一划分方式拓展了道德内容观的疆域，是道德基础理论多元道德内容观的重要基石之一。与 Shweder 的三元道德内容模型相比，五元论中的关爱、公平属于个人层面的道德，忠诚和权威属于集体层面的道德；洁净属于神圣层面的道德(Graham, Haidt, & Nosek, 2009)

(四) 传统道德判断与推理研究存在方法上的缺陷

道德认知心理学家常采用道德两难困境研究个体的道德发展(Christensen & Gomila, 2012)，但由于对道德内容的理解不同，研究者所设置的道德冲突的强度和类型存在差异，因此不同道德困境的同质性并不高。例如，已有研究中既有自私和道德价值的冲突，也有不同角色责任的冲突；既有不同道德价值观念的冲突，也有唯一道德原则和多元道德原则的冲突(Christensen & Gomila, 2012)。道德认知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情境集中在公平(海因茨偷药)和关爱(电车与旁观者)道德内容上，所反映的道德问题也局限于个体间的关系和规则方面。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道德判断更多的处于社会关系情境之中，人际层面的道德内容并不能充分解决社会关系中的实际冲突。例如，Fiske 从处理社会关系的动机角度，梳理了四种普遍存在着的调节关系的道德：团结、层次结构、平等、对称性(Rai&Fiske, 2011)。团结指关心和支持内群体成员，使其免受伤害；层次结构强调尊重社会群体中的纵向序列关系，即下级尊重上级、上级指导和保护下级；平等则促使人们追求均衡、平等的机会、话语权和资源分配；对称性强调按劳动和价值进行相应的奖惩(Rai&Fiske, 2011)。Fiske 的四元关系取向的道德内容划分方式也影响着 Haidt，道德基础理论中的忠诚和权威与该模型中的团结、层次结构基本一致，而关爱、公平的道德内容与传统道德研究关于道德的界定并无明显差异。

综合上述论述可知，虽然道德认知心理学家对以公正化规则和关爱为核心道德内容的道德形式研究影响深远，对儿童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具有突出贡献。但是与道德基础理论相比，忽视了对道德内容本身的探讨，使得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不够系统完整、解释范围有限、后续研究动力不足以及在现实中难以准确描述和预测个体道德行为。

三、总体评价与展望

(一) 道德基础理论的贡献与受到的挑战

道德基础理论通过先天性、文化可塑性、直觉性、多元性四个基本假设和关爱、公平、

忠诚、权威、洁净五元道德内容统合了道德形式与内容，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然而道德基础理论并非一个“完成的理论”，它只是提供了一些恰当的理论原则来重新框定道德研究的范畴。在该范畴内，道德基础理论本身仍在不断发展。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批评的意见，自道德基础理论提出以来，其基本假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先天性假设还需要更多来自基因、神经生物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支持（Suhler & Churchland）；关于直觉假设的挑战则集中在道德判断中认知和情绪成分所扮演的角色上，例如，双加工模型认为道德直觉与审慎推理同时存在（Greene, Morelli, Lowenberg, Nystrom, & Cohen, 2008）。

更多的挑战集中在多元道德假设以及五元内容是否充分必要地概括了道德内容的探讨上。例如，动机取向的研究者认为，道德基础理论未能完整描述道德内容，因为道德动机具有趋近与回避两个方向，所以，相应的就应该有支持性道德规则（approach-based moral procriptions）与禁止性道德规则（avoidance-based moral procriptions），而且，这两种道德规则都能够作用于个人、人际、群体三个互动层次。因此，道德内容就被划定为一个 2×3 的矩阵（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每个矩阵都是一个特异性的道德内容。然而，在该框架下道德基础理论的五元道德内容并不能将矩阵填充完整。比如，如果忠诚和权威的道德内容属于动机取向的群际层面的禁止性道德规则的话，那么与之对应的促进内群体凝聚力的支持性道德规则又是什么呢（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 Rai & Fiske, 2011）？此外，除了对于五元道德内容整体的思考外，也有研究者提出即使在五元道德内容的基础上，也还存在应该被纳入道德体系的个别的道德内容，例如自由 / 压迫（Liberty / oppression）、高效 / 浪费（Efficiency / Waste）、所有权 / 偷盗（Ownership / Theft）、诚实 / 欺骗（Honesty / Deception）等等（Graham et al., 2013）。经过审慎考虑，Haidt 及其合作者认为，追求自由、反对压迫这个道德基础可以解释那些没有明确的层级结构的群体的运作过程，因为这样的群体就是通过社会公正性来维持群体生存的。该道德基础不仅广泛存在诸多文化之中，具有明确的共享意义性，而且通过观察黑猩猩等高智能动物内群体成员的互动，也能从低地位成员相互联合起来反抗首领的权力更替模式中，发现该道德基础的进化机制（Janoff-Bulman & Carnes, 2013），因此，Haidt 已暂时将其纳入了他的道德基础理论之中（Haidt, 2012）。于是，就出现了将道德基础理论表述为道德六元论的说法。

总的来说，道德基础理论并非颠覆式的初创理论。Haidt 及其合作者批判性地继承了道德认知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同时身体力行地考察了道德判断的直觉过程及影响道德行为的诸多情境因素，重新界定了道德判断的来源和过程。经过实践的累积和理论的重构，他们

在 Shweder 的道德三元论和 Fisk 的道德四元论的基础上，整合了文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中关于道德的研究新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德基础理论。

道德基础理论不仅系统阐释了人类道德的共同来源机制、差异形成原因、具体判断过程和核心道德内容，也给了后续研究者完善理论、应用理论的巨大空间。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关于道德内容的研究需要以描述、解释、控制、预测道德行为为目的，结合不同分支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研究逻辑和研究工具，在特定研究问题的现实状况中进行。例如，对于道德内容的操作性定义，在探索以道德内容的生理机制为核心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就必然与社会治理中以解决群际冲突等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干预研究存在差异。结合当前心理学学科的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继续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考察道德基础理论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探索个体道德的发展和成熟过程。

（二）基于不同的道德内容研究个体的社会行为

目前，关于道德内容与个体态度和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且多数研究仍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倾向中，对于社会生活领域的行为决策涉及较少。这与传统的道德心理学研究取向道德内容范畴狭窄、重视道德判断的发展研究而忽视道德情感与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作为重要的价值原则和动力系统，道德对于助人、捐赠等亲社会行为，对于攻击、腐败等不道德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道德基础理论的框架下，研究者可以综合考虑不同道德内容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动机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概念划分上看，道德基础理论的多元道德内容分属不同的互动层面，用以解决不同的适应问题。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情境非常复杂，个体在行为决策时常常需要平衡和考虑多层次因素。例如，在决定是否帮助一个外群体成员时，个体会同时涉及关爱与忠诚的道德内容；在制定针对艾滋病人的特殊社会福利政策时，至少同时会涉及关爱、公平和洁净的道德内容。那么当道德内容间存在冲突或多种道德内容同时被激活时，个体的道德判断以及行为表现会遵从何种心理规律呢？是否存在“先行”的道德直觉？已有研究表明，与权威和忠诚相比，关爱和公平的道德内容更加具有基础性和文化普遍性（Blum, 2013），那么是否关爱和公平的道德内容对复杂情境中的个体行为决策影响更大呢？这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另外，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现有研究对于道德的跨文化、跨群体差异的探讨多停留在对道德内容的描述上，未来研究可以从动机的角度厘清道德内容的差异及其对于行为决策时的群体特征和群际互动的影响。例如，对于高宗教要求的群体来说，神圣性道德冲突比群体及个体层面的文化不一致更能预测其消极的外群体态度（Wu&Chiu, 2013）；从圣洁的角度来传递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可以增加保守主义者对环境政策的支持（Feinberg&Willer, 2013）。以上证据提醒我们，由于文化背景中个体所要面对

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法不一样，虽然不同群体都有共享的道德内容，但也许存在不同的“先行”道德，例如同样面对包含两个以上道德内容的情境时，不同群体的成员所依据的道德原则有差异，因而行为决策也不一样。该差异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群际关系、文化冲突甚至地区战争。

（三）基于道德内容开展道德发展的研究

道德基础理论认为，个体的道德发展是在先天道德直觉基础上通过文化学习获得的。而道德认知发展心理学家则秉持儿童自我建构论，认为真正的道德是儿童在与他人互动中，建构性地获得对社会规则的普遍认识（Narvaez, 2013）。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排他性地支持某一方的观点，未来研究需要在更为广泛的道德内容基础上纵深化探讨每种道德内容的发展。具体研究问题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关于道德内容的发展动因。根据道德基础理论的先天性假设与文化可塑性假设可知，个体道德系统的形成依赖于遗传及环境双重因素。然而对于每一种道德内容来说，这两种因素的作用机制是否一致仍不可知。第二，关于道德发展的过程。道德认知发展心理学家似乎就关爱和公平这两个个体化道德内容的发展过程给出了相对明确的理论描述，然而忠诚、权威、洁净这三个联结性道德发展过程仍不清晰。从上文论述可知，个体化道德内容与联结性道德内容具有不同的神经基础，且存在明显群体差异，因而其发展起点、敏感期、阶段特征很可能与关爱和公平不同，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三，关于道德发展的最终状态。近年来，关于完成模式的探讨在发展心理学领域愈发重要。对应到道德发展中即个体成熟道德系统的形成过程和结尾模式。与此相关的问题包括：儿童是何时开始理解不同的道德内容之间差异的？儿童如何协调和处理多元道德并最终形成一致的个人道德体系？另外，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和多元价值的冲击，成人是否面临着在已有道德系统基础上的道德再社会化的过程？

要解决上述问题，不仅需要在整合道德基础理论、道德认知发展阶段论以及社会领域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先进的研究范式及技术，同时也需要借鉴相近研究领域的已有成果。例如，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对社会排斥行为的预期，会为排斥者同时带来积极和消极的情绪体验，前者产生的原因是维护了团体的结构和功能，后者则是源于对受害者的同情（Malti&Dys, 2015），这反映了忠诚和关爱已经开始共同影响青少年个体了。又如，家庭教养方式方面的研究发现，控制惩罚能够负向预测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发展（Carlo, Mestre, Samper, Tur, &Armenta, 2010），但对于规则及权威的尊重等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总之，在跨领域的基础上开展道德基础内容的发展性研究，对于我们统

一道德内容和形式，全面地理解道德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傅鑫媛,陆智远,寇彧. 陌生他人在场及其行为对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5, 08:1058-1066.

[2]喻丰,彭凯平,韩婷婷,柴方圆,柏阳. 道德困境之困境——情与理的辩证[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1:1702-1712.

[3]张彦彦,陈浩. 西方道德心理学研究新进展:道德判断的五基准理论[J]. 道德与文明, 2009, 06:28-31

[4]Batson, C. D., Thompson, E. R., Seufferling, G., Whitney, H., & Strongman, J. A. (1999). Moral hypocrisy: Appearing moral to oneself without being s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3), 525-537.

[5]Blum, L. (2013). Political identity and moral education: A response to Jonathan Haidt's *The Righteous Mind*.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2(3), 298-315.

[6]Baril, G. L., & Wright, J. C. (2012). Different types of moral cognition: Moral stages versus moral foundation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4), 468-473.

[7]Cai, W., Huang, X., Wu, S., & Kou, Y. (2015). Dishonest behavior is not affected by an image of watching eye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6(2), 110-116.

[8]Carlo, G., Mestre, M. V., Samper, P., Tur, A., & Armenta, B. E. (2010).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 among dimens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sympathy, prosocial moral reasoning,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5(2), 116-124.

[9]Chapman, H. A., Kim, D. A., Susskind, J. M., & Anderson, A. K. (2009). In bad taste; Evidence for the oral origins of moral disgust. *Science*, 323(5918), 1222-1226.

[10]Christensen, J. F., & Gomila, A. (2012). Moral dilemmas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moral decision-making; a principled review. *Neuroscience Biobehavioral Reviews*, 36(4), 1249-1264.

[11]Cornwell, J. F., Higgins, E. T. (2014). Locomotion concerns with moral usefulness: When liberals endorse conservative binding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0, 109-117.

[12]Cushman, F., & Greene, J. D. (2012). Finding faults; how moral dilemmas illuminate

cognitive structure. *Social Neuroscience*, 7(3), 269–279.

[13] Deloache, J. S., & Lobue, V. (2009). The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human infants associate snakes and fear. *Developmental Science*, 12(1), 201–207.

[14] Dubois, D., Rucker, D. D., & Galinsky, A. D. (2015). Social class, power, and selfishness: When and why upper and lower class individuals behave unethical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3), 436–449.

[15] Ent, M. R., & Baumeister, R. F. (2015).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uilt proneness affect how people respond to moral tradeoffs between harm avoidance and obedience to author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4, 231–234.

[16] Feinberg, M., & Willer, R. (2013). The moral root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 56–62.

[17] Fry, D. P., & Souillac, G. (2013). The relevance of nomadic forager studies to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moral education and global eth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2(3), 346–359.

[18]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 Glenn, A. L., Iyer, R., Graham, J., Koleva, S., & Haidt, J. (2009). Are all types of morality compromised in psycho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23(4), 384–398.

[20] Graham, J., Nosek, B. A., & Haidt, J. (2012). The moral stereotyp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Exaggeration of difference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PloSone*, 7(12), e50092.

[21] Graham, J., Haidt, J., Koleva, S., Motyl, M., Iyer, R., Wojcik, S., & Ditto, P. H. (2013).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The pragmatic validity of moral pluralism.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55–130.

[22] Graham, J., Nosek, B. A., Haidt, J., Iyer, R., Koleva, S., & Ditto, P. H. (2011). Mapping the moral doma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 366.

[23] Graham, J., Haidt, J., & Nosek, B. A. (2009).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rely on different sets of moral found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5), 1029–1046.

[24] Greene, J., & Haidt, J. (2002). How (and where) does moral judgment work?.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6(12), 517–532.

[25] Greene,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Cohen, J. D.

(2008).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107, 1144-1154.

[26] Haidt, J. (2001).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4), 814.

[27] Haidt, J. (2012).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York: Pantheon

[28] Haidt, J., & Graham, J. (2007).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1), 98-116.

[29] Haidt, J., & Kesebir, S. (2010). Morality. In Fiske, S. T., Gilbert, D., &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797-832). Hoboken, NJ: Wiley.

[30] Hamlin, J. K., Wynn, K., & Bloom, P. (2007). Social evaluation by preverbal infants. *Nature*, 450(7169), 557-559.

[31] Henrich, J., Heine, S. J., & Norenzayan, A. (2010).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2(2-3), 61-83.

[32] Janoff-Bulman, R., & Carnes, C. N. (2013). Surveying the Moral Landscape: Moral Motives and Group-Based Moral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8).

[33] Kertzer, J. D., Powers, K. E., Rathbun, B. C., & Iyer, R. (2014). Moral support: How moral values shape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6(03), 825-840.

[34] Kohlberg, L. (1971). Form is to ought: How to commit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and get away with it in the study of moral development. In T. Mischel (Ed.), *Psychology and Genetic Epistemology* (pp. 151-23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5] Kohlberg, L., & Candee, D. (1984). The relationship of moral judgment to moral action. In L. Kohlberg (Ed.), *Essays in Moral Development: Vol. 2.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pp. 498-581). New York: Harper & Row.

[36] Koleva, S. P., Graham, J., Iyer, R., Ditto, P. H., & Haidt, J. (2012). Tracing the threads: How five moral concerns (especially Purity) help explain culture war attitud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2), 184-194.

[37] Krebs, D. L., & Denton, K. (2005). Toward a more pragmatic approach to morality: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Kohlberg's model. *Psychology Review*, 112(3), 629-649.

[38] Lewis, G. J., Kanai, R., Bates, T. C., & Rees, G. (2012). Moral values are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brain volume.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24(8),1657-1663.

[39]Malti, T., & Dys, S. P. (2015).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moral emotions. *Topoi*, 34, (2),453-459

[40]McCullough, M. E., Emmons, R. A., & Tsang, J. A. (2002). 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2(1),112.

[41]Mercier, H., & Sperber, D. (2011). Why do humans reason? Arguments for an argumentative theory. *Behavioral Brain Sciences*,34(2),57-74; discussion 74-111.

[42]Narvaez, D. (2013). The future of research in mor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42(1),1-11.

[43]Narvarrete, C. D., & Fessler, D. M. (2006). Disease avoidance and ethnocentrism: The effects of disease vulnerability and disgust sensitivity on intergroup attitude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7(4),270-282.

[44]Niemi, L., & Young, L. (2013). Caring across boundaries versus keeping boundaries intact: Links between moral values and 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s. *PloSone*, 8(12), e81605.

[45]Piaget, J. (1965). *The Moral Judgement of the Child* (M. Gabain, Trans.). New York: Free Press.

[46]Rai, T. S., & Fiske A. P. (2011). Moral psychology is relationship regulation: Moral motives for unity, hierarchy, equality, and proporti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118,57-75.

[47]Roccas, S., & McCauley, C. (2004). Values and emotions in the relational models. *Relational Models Theory: A Contemporary Overview*. (pp.263-285)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 Mahwah, NJ.

[48]Schaller, M., & Park, J. H. (2001).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and Why It Matter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2),99-103.

[49]Shweder, R. A., Much, N. C., Mahapatra, M., & Park, L. (1997). The 'big three' of morality (autonomy, community, divinity), and the 'big three' explanations of suffering. *Morality and Health*, ed. Brandt, . A & Rozin, . P:119-69. New York: Routledge.

[50]Smith, I. H., Aquino, K., Koleva, S., & Graham, J. (2014). The moral ties that bind...even to out-group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moral identity and the binding moral found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25(8),1554-1562.

[51]Suter, R. S., & Hertwig, R. (2011). Time and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119(3),454-458.

[52]Sverdlik, N., Roccas, S., & Sagiv,L.(2012). *Morality across cultures: A value perspective.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oralit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Good and Evil.*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53]Tooby, J., & Cosmides, L. (1992).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ulture. In J.H. Barkow, L. Cosmides & J. Tooby (Eds.),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pp.19-136). New York: Oxford.

[54]Triver, R. L. (1971). 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35-57.

[55]Turiel, E. (2006). Thought, emotions, and social interactional processes in moral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pp.7-35).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Mahwah, NJ.

[56]Van Leeuwen, F. , Park, J. H. , Koenig, B. L. , & Graham, J. (2012). Regional variation in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endorsement of group-focused moral concern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33(5),429-437.

[57]Wark, G. R., & Krebs, D. L. (1996). Gender and dilemma difference in real-life moral judg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32(2),220-230.

[58]Wu, Y., Yang, Y., &Chiu, C. Y. (2014). Responses to religious norm defection: The case of Hui Chinese Muslims not following the halal di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39,1-8.

Western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The new synthesis approach to moral research

ZHANG Meng-Yuan, YUAN Ming-Liang, KOU Yu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NU, Beijing100875,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s moral system consists of moral contents and moral forms, defining what one's morality is and how it works. Based on rationalism, traditional moral research has long focused on moral reasoning and judgment rather than instinct, emotion and behavior. In addition, because it neglect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cannot describe systematically the whole picture of individual's moral landscape. With th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neur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there has emerged a new and synthesis approach of moral research, which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The theory proposed that morality is innate, intuitional and pluralistic, and could be learned from culture. Basic moral foundations include 5 original dimension: Care/harm, Fairness/cheating, Loyalty/betrayal, Authority/subversion, and Sancity/degradation, and one newly found dimension of Liberty/oppression. Current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the theory invol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foundations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differences of moral foundations cross different groups, and the reasons inducing these differences.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how the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moral foundations influence social behavior of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s moral development on the foundations of pluralistic moral dimensions.

Key words: moral content; moral foundation theory; pluralistic moral foundation